第一章

论中国智慧

——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

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在悠悠五千余载的有文字可考的生存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的文化。但从近代以来，这种包含我们民族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一代代学人的深长思考……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和出路的人们都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正确阐释和恰当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智慧？如何把握中国智慧的基本精神？其合理性和现代价值何在？中华民族又如何在秉承这份厚重的遗产基础上建设走向21世纪的新文化、创造新智慧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这是众所关注、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我们要探索讨论的中心课题。

第一节　中国智慧的阐释方式

如何更好地阐释中国古代智慧？如何正确反映中国古代智慧的基本面貌？这里面既有思想观点的差异，又有价值趋向的不同，其中的关键是方法问题。目前在对中国古代智慧的种种阐说评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有三种特别值得关注的基本观点和趋向。

一是关于正统教科书的观点。传统的中国哲学教科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阐说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包括：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从社会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去说明哲学意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演化，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当然，有的教科书在说明哲学思想自成系统的传承方面还不够；其次，确定了哲学基本问题在阐述论证中的核心地位，以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对立对哲学智慧的内容进行分疏与评价，虽有其可取之处，但远远不是哲学的全部 再次，按照自然观、社会历史观、认识论、伦理价值观、人性论等作为论述的经纬，条分缕析，突出了传统哲学智慧中这些前人尚未发掘的方面，指出其中包含的合理性和现代价值，这也做得相当不错。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学人都为此作出了贡献，实有不容否定的成绩。

但是，我们认为，正统的哲学史教科书也包含着若干重大缺陷，其中最为根本的缺陷是离开了中国智慧本身的特征，找不到中国特色或中国风格。这里包含着逻辑上的失误：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普遍性”的哲学，然后去阐说中国哲学与“普遍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表征了普遍哲学，中国哲学成了普遍哲学的注脚。同时，因为中国哲学主要部分是传统的旧时代的哲学，按照“革命的需要”，要求将其全部打碎，从总体上加以否定，进而寻找可资利用说明的残砖片瓦，由此编出来的哲学史教科书“革命色彩”浓了，却离开了中国智慧的本色，很难冠之以‘中国哲学史’的称号。其二，在方法上，只注重分析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因素，却不注重阐说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的特殊性，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教条主义在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表现。在这些教科书上，中国智慧的一些特殊性，

由于不合“普遍性”的范式，常常是作为否定的东西出现的，例如，有的教科书，将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简单地将其断定为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或比理性思维更落后更原始的东西，却未能充分肯定其在获取人的智慧、艺术成就、道德境界等方面的价值。我们认为，丢弃了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殊性，也就找不到中国传统智慧的灵魂、本质和精神。其三，正统哲学史教科书受现实政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太频太多太深。在有的哲学史教科书中，似乎哲学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判定一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却忽视了哲学内容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哲学要全面地阐述人与世界的关系，智慧就是人与世界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结晶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也是变化的。哲学史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唯物、唯心，只讲本体论中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这只是停留于 18 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马克思认为，哲学家既要解释世界，也要实践地改造世界，对世界和人生，不仅要从物质的角度或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更重要的是要从实践的角度，从感性、现实、生活即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有的哲学史教科书，根本不涉及中国古代哲人对内在世界、高尚境界的追求，也不涉及中国哲人对真与善、知识与德性关系的回答，这实质上阉割了中国智慧的核心内容。凡此种种，传统哲学史教科书并没有正确地反映中国智慧的基本面貌

二是关于文化保守派或新儒学的观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新儒学思潮，到 80 年代在港、澳、台和国际华人圈已蔚为大观，对中国大陆亦有一定影响新儒学的立场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范畴，他们抓住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智慧的特点，较能贴近传统的本色在一定意义上看，他们真正回答和阐发了“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智慧”的问题他们也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气”、“理”、“太极”等范畴按照中国化的要求进行了现代意

义上的阐释，并多有发明他们对中国智慧的基本内容、统系脉络进行了甄别和梳理，并结合西方哲学，用新实证主义、柏格森主义等西方哲学范式与中国哲学对照、比较，在不少方面得出了正确的合理的结论。

然而，由于新儒学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以宗教式的虔诚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无疑他们是将传统智慧神圣化了在他们的阐释中，传统的糟粕、疠气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而且离开了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去说明思想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他们不是以批判的、分析的立场对待传统，而是高扬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无条件地回归于传统同时，海外新儒学的大部分学人，由于家世、出身、个人经历等复杂原因，采取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而未能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虽然他们也尽力包容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理性等内容，但囿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却未能正确界定、区分、处置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如何汲取西方民族竞争、开拓进取的精神，如此等等

三是关于智术化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一股"本土文化热"，一些人错误地、片面地理解和利用传统，将纵横捭阖的阴谋、尔虞我诈的权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学"以至卜命算卦、勘舆风水、导引辟谷如此等等，统统冠之以"中国智慧"在他们看来，所谓"智慧"就是无耻、无行、无特操的智术者流。这就将中国智慧大大低俗化、实用化了，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亵渎和曲解究其根由，是一些无行文人，为迎合人们在中国现代市场大潮中梦想一夜暴富而提供不入流的末技怪招，是写作者和奉承者心中的"孔方兄"在共同作祟我们认为，"术"是操作方法、经验技巧，是人的实践能力和通同成功的途径，无疑，中国智慧作为个整体概念，也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但"术"必须受到"道"的制约

道是术的本体或基础，没有脱离道而独立自存的孤立的术。把中国智慧描绘成一堆智术，这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

我们认为，正确阐释和评价中国智慧，既要有恰当的方法，也要全面、公正、客观、平允地研究问题，评价史料，并力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在阐释方法上，我们以为，下述各个方面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必须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忠于史实。我们认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哲学史上的问题，绝不等于简单地运用唯物或唯心、辩证法或形而上学去图解史料，而是要从哲学的中心课题——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的把握中去认识、研究某一哲学家、某一哲学思潮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无论是对人的内在世界的深人探索(这往往与‘唯心主义’有关)，或者强调对外在客观世界本质规律的认识(这往往与唯物主义有关)，或者注重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多方面探讨（这往往表现为哲学内容的多元性、复杂性），都应该根据史实给予相应的肯定，同时又要对其错误作具体的中肯的分析。在一些哲学史家的著作和哲学史教科书中，有的人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常常将占统治地位的即正统的为统治阶级所肯定的哲学思潮作为反面的东西对待，这也不尽妥当。我们认为，正统的并不等于就是反动的，对正统的思想也要作具体的恰当的分析，肯定其正面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具有民主性思想的精华部分，否定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为专制主义张目的糟粕的内容。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根本，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其次，以中国智慧的自身特点作为研究立足点古希腊哲人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研究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寻找“物自身”，即“事物本身是什么”，也即事物的本体、实体、本质是什么，因为这是万事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同样，回答‘中国智慧是什么？’必须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找中国智慧（中国传统智慧，或中国古代智慧，这三个词在我们书中是完全一致的）自身的本质为何？中华民族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并进而解决生存实践的最重要的特点又是什么？它异于西方智慧从而体现中华民族风格的基本趋向为何？中国智慧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发展前景怎样？只有恰当地回答以上问题，才算是抓住中国智慧的本身或本体；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才可以进一步提出，中国智慧中哪些成分是值得我们珍视、继承、保留、发扬的，哪些因素是需要克服、改进的，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更高的智慧，规划民族的美好未来。

再次，注意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智慧，要以西方智慧作为参照系。从人类智慧的整体性看，无论是中国智慧、西方智慧还是印度智慧，都是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无论哪一种智慧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它们各自具有自身的特色、价值和缺憾。寻求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不能离开西方智慧这个参照物。这是因为两者是大有差别、风格迥异的精神系统。如何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西方人的观念很是不同，表现出的智慧也不同，在"人"、"社会"、"自然"中，中国人更多地抓住了人和社会，中国人也讲"天"，"天"似乎是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宇宙或自然，但是，中国人的"天"在传统观念中却赋予了主体价值的色彩，究其根由，还是归属于人或社会的。因而，中国传统智慧没有将"人"与"天"（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作为对立的二项彻底分开西方人则更多地抓住了"自然"，而把具有整体性、精神性的主体即人抽象为"思维"或"精神"，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分析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智慧没有做的，或做得很不彻底的，由此表现为明显不同的两种思路事实证明，只有通过不同智慧系统的比较，才能凸显中国智慧的本质和特征，可以说，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对中国传统智慧内容和本质的真正探

又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般的中国哲学著作是按照时间为参考系排列写成的，这种阐释方式可以称之为“叙述”的，即是将事实依时间顺序陈列展现出来，如是而已。我们认为，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智慧的民族特色并与西方智慧相比较，除了必要的叙述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论述”；因此，要更强调哲学问题、理论和逻辑的优先性，在此基础上兼顾历史发展的顺序性，也即是说，共时性高于历时性，论述高于叙述，并由此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我们认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是凝聚的统观的哲学史，哲学史则是展开的演化的哲学，在这里，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因为，照黑格尔看来，哲学的发展也就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完善，他说：“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向外追逐，失掉其自身于外界，而它之向外发展同样也是向内深入。这就是说，普遍的理念始终是内在的根本，是无所不包和永恒不变的。”①哲学的发展是哲学理念的“生命成长”过程，而理念自身是贯穿于每一阶段、每一部分之中的，“——哲学系统是一个理念的全体和它的一部分之发挥，好像在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里，一个生命、一个脉搏跳动贯穿着所有肢体一样。”②所以，我们认为，与西方智慧不同的中国传统智慧，必有贯穿于其中的、始终一贯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显然不能单纯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史料“叙述”中找到，而是必须将中国古代智慧看做是一种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程、阶段和内容并且虽丰富繁杂、变化多端却不失其统一性的整体看待，要从这种内容丰富庞杂的哲学史发展过程的全体中（指迄今为止的“全体”）抽象概括出其中的“普遍理念”，这种“普遍理念”即是中国智慧的本质或精神，从而能够回答“中国智慧自身为何”的问题，同时，也就是我们研究探讨的对象。因此，我们的“论述”不是从直观性的时间顺

①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册，第 32、33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序出发去论说中国思想史的起承转合，而是以理念或逻辑作为论说的起点，同时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看成是理念在时间中的展开，也即以逻辑、概念、问题作为探讨研究的中心线索，旁及思想的历史发展演变。因而我们的研究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抽象到具体,不是从史到论,而是由论到史,总体来说,又不失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我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抓住中国智慧的本质,结合史料,层层展开分析,这不但不违背历史真实,而且能更深刻反映所述对象的基本面貌和内在精神。

第二节　智慧辨义

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关注"智慧"学说讨论的哲学家主要有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契先生,下面对三位先生的观点作一简单的述评。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学说作了一定探索。冯先生用知识和智慧两词来区分科学和哲学，并由此提出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他认为，科学能给人提供积极的知识，而哲学则不给人们增加任何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结及解释，而可以各言说出之者。哲学之有靠人之思与辨。"①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又说:"哲学是由一种自反底思想出发。所谓自反者,即觉解其自觉解其自己。……科技使人有了解，哲学使人觉解其觉解。""科学家如能本其所有的知识,自反而了解其知识的性质及其与宇宙人生的关系,则自反即觉解的自觉解。"…"如此,则此以前所

①参见冯友兰《新理学》绪论，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

有底知识，即转成智慧。借用佛家的话说，此可谓之‘转识成智’。”①在《新知言》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真正形而上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②“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③冯先生所谓“觉解其自觉解其自己”，是指对自己觉解其自己，“自觉解”是指自己觉悟理解，属于知识和经验的范畴，其对象是经验物；“觉解其自觉解”，是指对自己觉解的觉解，即对自己经验、知识、价值的自我反思、评价和理解。知识是对自己获得的感性经验的总结概括，而哲学是对知识的总结和概括。科学家如果能对自己获得的知识进行自觉的反思，并由此联系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或意义，这叫做“转识成智”，知识也就上升到能观照宇宙人生本性的智慧，获得人生的自由。冯友兰先生指出的科学与玄学的区别，提出“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转识成智”,对我们理解智慧的内涵极有启发，但冯先生过于强调知识与智慧、科学与哲学的区别，忽视了二者的关联，把“智慧”仅局限于哲学一途，就难免有将“智慧”玄学化、狭隘化之嫌。

金岳霖先生在《论道》、《知识论》等著作中对知识与智慧的关系进行了论说。他在《论道》一书的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知识论的裁判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解的了解,而且在

①参见冯友兰《新原人》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②参见冯友兰《新知言》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③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八章

研究的结果上，要求得到清楚的满足，这是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玄学的态度的主要之点。金先生将人以理智的态度去看待外在对象而获得认识，归于知识，而人以整个身心拥抱活动对象，生命的存在与从事的研究融为一体，就必然关涉到智慧学说。智慧是要回答‘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超形脱相’的形而上的问题，超越了理智的范围。金先生上述区分是必要的，然而他过于局限于理智认识的作用范围，否定了人的理智认识也构成了智慧学说的基础。“转识成智”是说从人的理智到智慧形成有一个由此达彼的桥梁，这种桥梁需要我们去回答和揭示。

冯契先生的《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等著作,对‘智慧’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归纳起来，冯契关于智慧学说的论说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智慧和知识的区别和联系，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以及提出‘究与通’‘得与达’等命题,并展开了深入讨论。二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智慧学说的阐释和发明。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蕴藏着的最深邃的智慧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不论儒家、道家,还是玄学、佛学、理学、心学,都以为本体论（即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和智慧学说是统一的。”①冯契对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儒家哲学、王夫之哲学多有发明和新解。三是把智慧学说与境界、自由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指出：“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和人的自由发展内在地相联系着，这就是智慧。”②他以‘庖丁解牛’为例,阐说智慧、自由与境界的关系：这些寓言，一方面朴素地把‘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哲学思想体现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中，成了诗的意境；另一方面也触及到了艺术创造的规律性,如何由‘技’而进于‘道’,由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

①冯契：《智慧的探索》,第 471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年版。
②冯契：同上书,第 636 页。

国。”①四是强调认识论和逻辑学说在“智慧”中的关键地位。冯契把认识论理解成广义认识论。金岳霖认为，知识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冯则认为这样划分,未尽妥当,广义的认识论不局限于知识的理论，而是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如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顿悟’‘直觉’以及‘德性之智’都可以归属于智慧学说。冯契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逻辑，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为此他撰写《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三卷本著作。他写道：“要对逻辑与方法论、自由理论与价值观这两方面作批判的总结，按我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观点，方法和德性二者还有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二者都归结到智慧学说。”②按以上所述,冯契先生的研究，在融会中西方哲学、汲取前辈思想精粹、结合时代需要并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在智慧学说的探索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值得肯定。但他把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仅归结为“性与天道”,在智慧学说中突出‘广义认识论’或‘逻辑’,这些观点仍不无可商榷之处,而且,冯契先生将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观点,一般都直接指陈为反动的应受批判的，这样的提法也未尽妥当，对正统的观点仍需要分析，不宜一概否定。我们认为，只有从人与世界之间多方面的复杂的总体性的关系中，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认识、揭示、把握智慧的本质和精神。

“智慧”在人类生活中是一个常用词,在现代汉语中,智慧指的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 1479 页)。在古代汉语中,“智”有人的聪明才能、谋略机智等意,智慧指聪明、才智、知识。在佛学中,智慧指破除迷惑证实真理的能力,梵语‘般若’,有彻悟之意,如《大智度论》四三卷：“般若者,一切诸智慧者最

①②冯契:《智慧的探索》第 493、61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穷尽到边。'般若即是无可比拟的最上智慧(参见《辞源》第780页)。在英语中,智有两词:wisdom, intelligence,前者有智慧、才智、明智、知识、学问等意,后者指智力和理解力。可见,在汉语、梵语、英语中,智慧一词的用法是基本相似的,归纳起来,有两方面的解说:一是从常识的理智的角度,将智慧定义为聪明才智、知识学问和辨析判断、创造发明的能力;二是从超验的形而上的角度,将智慧与对宇宙本体、人生真谛的彻悟和具有上帝那样的神明联结起来。显然前者属于生活、常识、经验的范畴,是"经验的智慧",后者成为哲学(元学、玄学)、宗教讨论的话题,是"理性的智慧'或'神性的智慧",哲学家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运用和阐说,但归根到底二者仍是相通的,仍是人的智慧。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①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将各种各样的智慧和具有智慧的人加以区别。亚里士多德指出,求智是人类的本性,人类由经验而得到知识和技术,但是"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是治不好病的;因为他所要诊治的恰真是些'个别的人'。我们认为,知识和理解属于技术,不属于经验,我们认为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智慧由普遍知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②。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智慧"渗透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各种形式之中,但有深度与程度的不同。经验中的智慧与技术中的智慧或知识中的智慧以及哲学中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工匠的本领局限于依样画葫芦式的制造,能做成满足实用需要的物件;技术专家就不仅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同上书,第2页

要知事物之所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既有经验又有理论,并能以理论指导实践,因而比工匠更有智慧;工艺美术大师能突破既有工艺规范的束缚,是富有独创性的人物,没有非凡的洞察力,没有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就无法进行独创。工艺大师是富于智慧的本行业的顶尖级人物，而且由于他在行业领域突破了前人的阈限,因而起到了划时代、开创新的工艺规范的历史作用。

智慧蕴藏于人的基本潜质之中,只有"人"才有长于万物的智慧之光。按照基督教的启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才使人拥有自我创造发展,认识事物本质规律和驾驭自然万物的能力。从人的基本素质而言，敏锐的观察力，惊人的摹仿力，深邃严密的思考,神妙高超的悟性,卓越独到的见识,宽广博大的胸怀,明察秋毫的判断,当机立断的决策,精干练达、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如此等等，都是人的智慧的具体表现。

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只有从人与世界的普遍性关系中,才能真正把握智慧的实质，智慧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正是来自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复杂性及人的生存实践方式的多样性。马克思谈到哲学意识在把握人与世界关系中所表现的作用和特征时指出，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一。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用哲学意识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专有的特殊的方式，它不同于譬如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方式。马克思在这里将哲学、艺术、宗教、道德(实践——精神）作为并列的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我们认为，智慧是人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它贯穿于其他各种方式之中，即是说，人把握世界的每一种方式有其特殊性，智慧则是它们的共同

性。因而，我们认为，在这里必须提出如何把握智慧或智慧的形式是什么的问题，要讨论智慧与哲学、艺术、宗教和一般知识的关系。

首先，智慧与哲学的关系。“智慧”概念与“哲学”概念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哲学是智慧的最高形式，智慧的最高层次则构成了哲学的内容。哲学就是智慧之学，古希腊人将哲学界定为“爱智慧”；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是追求真理、热爱知识。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以一定的范畴、概念、逻辑关系去说明一种智慧，同时，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穷尽智慧。任何一种哲学作为智慧的形式，总是有局限的，都只能说明智慧的某些方面。哲学就是要不断提出问题，不然，哲学的内容就要被窒息了，而智慧正是问题本身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没有问题也就不需要智慧，而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就谈不上智慧。如此，哲学是启发智慧、追求智慧的过程和结晶，是关于智慧的知识体系，而智慧则是哲学追求的目标本身。可见，智慧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和意义，事实上比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体系的涵义更丰富更广泛。但是，哲学不是讨论具体的智慧或经验的常识的智慧，而是专门研究人与世界的一般性、总体性关系的智慧即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万物的本原、人的本性、何为真善美等等寻根究底的问题，是关于最高层次智慧的形式问题。上述冯友兰、金岳霖、冯契先生所述“智慧”，实指的是哲学智慧，或狭义的智慧，而非涵盖经验的、技术的、观察和决策的及哲学智慧自身的广义的智慧。

其次，智慧与知识的关系。智慧不同于知识，同时又贯穿于知识之中。知识是人运用理智的态度冷静地认识外在世界，对自然、社会等客观事物本质规律有所认识并进而形成的概念结构体系。智慧与知识不同，但却内在于知识，智慧是贯穿于知识认知过程的原则、方法和精神，一切知识的获得，无不是主体运用智慧——即

高超、合适的方法把握对象事物本质的结果；智慧又高于知识，因为智慧并不局限于现存知识本身，而是要进一步追求知识、发展知识、反思获得知识的方法、结果和影响以及知识与我们生存世界的关系，尤其是知识与人的关系，如此等等。只有当知识成为主体追求的目标并融入于主体的生存世界之中，因而使主体追求知识的活动与主体的生命存在本身融为一体，并上升为主体生命的意义时，才能实现“转识成智”的飞跃，知识就转化为主体的德性和智慧了。可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智慧与知识的区别，而且要深刻体认两者的内在统一性和由此达彼的相通性。

其三，智慧与宗教、艺术的关系。我们认为，人与世界之间可以界定为多方面的关系，如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实践关系和信仰关系等，每一种关系都可以看做是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而每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就是对世界及自我本身的特殊的意义设定。科学和知识所面对的是一个现实存在世界，人类日常生活所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世俗世界，与之不同，宗教和神话所设定的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的彼岸世界、神怪世界。彼岸世界所示的是一种超越的世界，这种“超”和“越”是指超过了现实，越过了世俗。相反，智慧作为合乎理性的范畴，要求以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基础，它不能离开这个基础。但是，智慧的内在本质又要求突破现实的桎梏，创造、发明、设计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东西，要求超越现实。智慧对宇宙本体、人生真谛的洞察是整体的宏观的，非常抽象的，也是超越的，智慧设计的理想、目标、创造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更是超越的，智慧的本质在于不断超越世界与自我本身。就追求超越世界而言，智慧与宗教有共同性，但宗教的彼岸世界是否定现实的，其根据在于人之“情”而智慧的超越世界却以现实存在为基础，是现实世界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发展，其根据在于人之“理”。

智慧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也是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是通过人创设的形象、具象、意象的典型性来表现客观实在世界。艺术的形象既是典型的，还应该是寄托人的情感的，将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以适合的方式表达出来。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世界，同时也要表现人类的共同性、普遍性，人的内在的东西和人本身，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智慧。因而，艺术之中有智慧和哲学，也可以成为智慧的形式。诗更是如此，与智慧靠得更近。诗与哲学可以直接统一起来,所谓‘诗化哲学’或‘哲理诗’就是如此。并且,只有蕴涵智慧的艺术才成为深刻的艺术。一部小说《红楼梦》，一部戏剧《哈姆雷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反映了高超的艺术作品常常是复杂深刻的，包含了极高的智慧。

智慧追求的超越世界也可称之为“可能世界”。即以人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道理的认识为基础，获得关于事物的普遍有效性的原理、理论和知识，以此作为创造、设计新事物的前提条件。除了客观性知识以外，智慧的创造性的发挥还有赖于主体对于外在对象的意义性的选择、评价和确认，通过对外在事物意义性的确认,主体不仅规范了对象,也确认了自我的价值,回答了对象‘应如何’和主体自己的‘我欲求’。然后,将主体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对事物的意义评价结合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主体构建、创造存在世界不曾有的新事物的基础，这就是体现人类智慧的巧夺天工的“创造”和‘发明’。因而,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可能”一词,依金岳霖先生之见,“能”是说不得的宇宙的基本质料或潜能,“可”即式、规范、逻辑,“可能”就是将‘能’纳入“式”,这是基于宇宙基本质料的创造。可能世界就是主体创造的理想世界或超越世界，这种

超越世界从客观的方面看，是自然和社会存在面貌的实际的改变和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从主体方面看，则是主体的思想境界的升华和主体创造力的提升，从而获得人的自由，二者又共同体现了智慧的本质要求。

因此，智慧的高级层次是发现、发明与创造，即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追求原理、原因和知识是智慧创造的基础。智慧的创造从表现形式而言是独一无二，人无我有，但是智慧的创造背后又隐含着‘类’的普遍性，包括‘物类’的普遍性和‘人类’的普遍性，是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因而，智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虽然是个体所为，但是却对民族、国家以至人类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普遍适用的。显然，这种独创性来自于主体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层本质和原因的独一无二的领悟，没有这种领悟，原创性就不可能，这也是主体发明了一种‘式’‘规范’去概括了宇宙的基质‘能’，从而使发现、发明、创造成为‘可能’或者是主体赋予旧有‘式’‘规范’‘可能’以全新的意义和内容，从而在人类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一切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实质上都是由他们所拥有的原创性的地位、作用、影响来确认的，这是评判他们的主要尺度。因为这种原创性或独创性既是创造者的个体性特殊性的表现，又体现了人类价值，具有普遍性，作为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不可重复的，是‘天下不可无此人’‘天下不可无此书’‘伟大’‘杰出’‘卓越’一般指的就是某一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其他人所无可替代的，从而表现出深邃的智慧。孔子之于‘仁义’，老子之于‘自然’，柏拉图之于‘理念’，康德之于‘批判’，是说他们对其阐述的命题作出了别人无与伦比、不可企及的深刻说明，达到了‘智慧’的高度 同样，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表了人类前进的脚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一切高超的智慧都是通过独特的创造表现出来的，是“外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